

观点速览

泥土里长出的文字最动人

“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近日，一位农民王大爷笔下的《我的母亲》，用最朴实的语言道出了最深沉的情感。这位大爷的文字之所以动人，恰恰在于它没有精心设计的结构，没有刻意雕琢的修辞，有的只是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记忆与思念。

反观当下，我们的文字表达正陷入两种极端困境。一方面，是专业写作者的文字越来越精致，却也越来越空洞。他们娴熟地运用各种写作技巧，却常常忘记了文字的使命——传递真实的情感。另一方面，是社交媒体上泛滥的情绪化表达，看似真情流露，实则多是浮于表面的情绪宣泄。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像大爷这样既有生活厚度又有情感温度的文字，显得尤为珍贵。

文字最美的样子，不是被供在文学殿堂里的标本，而是像大爷笔下那样，带着生活的泥土，冒着热气，从心底自然生长出来的样子。

(7月14日 红网 王志高)

微短剧
如何让抗战精神“破圈”

红色记忆的传承，关键在于让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情感共鸣的入口。微短剧的优势在于，它可以用更贴近年轻人审美和观看习惯的方式打开历史之门。通过快节奏的剪辑、沉浸式的视听体验，甚至加入互动元素，微短剧能够将历史故事转化为一场可参与的情感旅程。这种参与感，正是打破代际壁垒、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关键。

抗战故事是影视艺术创作的“金矿”，微短剧的“轻”并不意味着内容的“浅”。相反，要在短时间内打动人心，创作者更需要深挖历史细节，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为根基，进行艺术化的提炼。例如，展现敌后游击队的机智勇敢，不能仅停留在表面的战斗场面，而应通过具体的情节设计，如传递情报时的惊险、军民鱼水情深的互动，让观众感受到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同时，创作者还需平衡艺术表达与历史真实，以敬畏历史的态度，将抗战时期的家国情怀、英雄气概转化为当代观众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力量，避免过度娱乐化，消解历史的厚重感。

(7月14日 《云南日报》 刘少华)

媒体应成为“阅读生态构建者”

田晓蕊

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全民阅读作为提升国民素质、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路径，其意义早已超越读书本身。今年4月在山西太原举办的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以“培育读书风尚 建设文化强国”为主题，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

山西综合广播作为省级主流媒体，以70余年的历史积淀为根基，以融媒体技术为翼，在此次大会的融媒体访谈中探索出一条“干中学、变中进、树信心”的实践路径。这不仅是一次媒体融合的实战演练，更是对“媒体如何赋能全民阅读”这一核心命题的深刻作答。

全民阅读的时代价值与媒体使命

全民阅读的本质是一个国家通过文化浸润实现文明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从个体维度看，阅读是获取知识、提升思维的基本方式；从社会维度看，阅读风尚的形成能够凝聚价值共识、培育理性精神；从国家维度看，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石。

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主阵地，在推动全民阅读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使命。传统广播凭借其伴随性强、覆盖广泛的特点，曾是知识普及的重要渠道；而在媒体融合时代，广播的使命不再局限于“传播信息”，更要成为“阅读生态的构建者”。山西综合广播作为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权威信息发布平台，其覆盖全省11地市及周边省份的技术优势，使其天然具备连接城乡、贯通圈层的传播能力。在全民阅读推广中，这种能力转化为独特价值：既能将高层政策解读传递到基层，又能将民间阅读故事传播到更广领域，形成“上下联动、全民参与”的阅读推广格局。

实践路径：在创新中构建全民阅读传播体系

“干中学”：以专业能力夯实传播根基
媒体传播的生命力在于专业，而专业能力的提升往往始于实践。山西综合广播接到连续3天、每天5到6个小时的直播任务时，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从“音频思维”向“融媒思维”的跨越。多数成员对视频拍摄、镜头表现等知识较为生疏，但这恰恰成为突破自我的契机——团队以“零起点”心态从头学起，前期进行两天集中演练，每场正式开播前带领主持人反

核心阅读

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主阵地，在推动全民阅读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使命。传统广播凭借其伴随性强、覆盖广泛的特点，曾是知识普及的重要渠道；而在媒体融合时代，广播的使命不再局限于“传播信息”，更要成为“阅读生态的构建者”。

复彩排，甚至细化到镜头角度、手势表情等细节。这种“在实战中补课”的过程，不仅让团队短期内掌握了融媒直播的技术规范，更培养了“用户视角”，意识到视频直播中“视觉吸引力”与“内容深度”同等重要，从而在后期调整中既注重嘉宾表达的专业性，又兼顾画面呈现的生动性。

这种专业能力提升的背后是对媒体使命的深刻认知：全民阅读推广不能停留在“喊口号”，必须以高质量的内容和形式打动受众。为此，团队在前期做足“理论功课”：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整理书香社会建设的典型案例。这些学习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砌，而是转化为直播中的“问题意识”——当主持人与嘉宾探讨“经典阅读的当代价值”时，能够自然关联到《论语》在现代家庭教育中的应用；当谈及“乡村阅读推广”时，能够结合山西农村的实际需求提出可行建议。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逻辑，让直播内容既有高度又接地气，避免了空洞化、形式化的传播。

提前布局嘉宾邀约，更体现了对传播规律的尊重。在嘉宾名单尚未确定时，团队主动对接省出版集团、省作协、省妇联等多个部门，梳理出可能参与的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及基层阅读推广者，形成“嘉宾储备库”。主持人还专程前往赵树理的故乡尉迟村采访，联系司马光后人收集素材，让历史与现实在访谈中形成对话。这种“跳出直播做直播”的思路，本质上是为了让全民阅读的讨论更具“地方独特性”——山西作为文化大省，有丰富的阅读故事可讲，将这些故事融入访谈，既能增强本地观众的认同感，又能向全国展示山西的阅读生态。

“变中进”：以模式创新提升传播效能
媒体融合的核心是“以变求进”，即

根据传播目标调整传播策略。山西综合广播在这次直播实践中经历的三次重要调整，生动体现了这种创新思维。最初，团队计划将直播定位为“山西特色展示窗口”，甚至考虑联动沿黄九省（区）扩大地域影响力，但在向相关部门汇报后，果断将定位升级为“大会能量的集散地”。这一转变看似缩小了地域范围，实则拓展了传播格局——从“地方视角”转向“全国视野”，让山西的实践成为全民阅读的缩影，吸引了更多省外观众的关注。这种调整背后的逻辑是：全民阅读是全民性议题，媒体传播需要跳出“小圈子”，在更大坐标系中找到自身价值。

定位升级带来的挑战是嘉宾邀约标准的提高。为了邀请到能代表“全国视野”的重量级嘉宾，团队主动与管理部门沟通。最终，37位嘉宾中既有行业权威，也有樊登、“蛟龙”号女科学家等跨界名人，还有基层教师、农民阅读推广者等“民间声音”。这种“多元阵容”的构成，是对全民阅读“全民参与”理念的呼应，阅读不分阶层、职业，每个人都是阅读的受益者和传播者。

直播模式的迭代则更直接体现了“用户中心”理念。初期采用“音频为主、视频为辅”的轻操作模式，但团队发现观众对视频内容的互动热情远超预期，于是迅速调整为“视频为主、音视频同步”的模式。这一转变涉及技术团队配置、主持人表现风格的全面调整：技术人员增加视频监控设备，确保画面稳定；主持人则更注重镜头前的状态，通过眼神交流、肢体语言增强亲和力。观众通过提问、留言分享阅读故事，形成“直播间里的阅读沙龙”。这种模式创新的价值，在于打破了传统广播“单向传播”的局限，让全民阅读从“被动接收”变为“主动参与”。正如一位观众在

留言中所说：“看着别人分享读书心得，自己也忍不住想拿起书来。”

“树信心”：以成果价值凝聚发展动能
3天15小时的直播，山西综合广播最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37位嘉宾深度参与，各平台总浏览量达686.12万人次，新媒体报道全网总浏览量超百万，更重要的是，观众反馈中“激发阅读兴趣”“深化阅读认知”等评价成为高频词。这些数据背后，是传播价值的真实体现——当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冯士新解读“阅读生态建设”时，观众理解了全民阅读需要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当樊登分享“碎片化时代的深度阅读方法”时，年轻人找到了兼顾效率与深度的阅读路径；当农民阅读推广者讲述“乡村书屋改变生活”的故事时，更多人意识到阅读推广需要下沉到基层“最后一公里”。

技术层面的突破同样具有长远价值。团队成功解决了直播中功率超载、网络拥堵等难题，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大型融媒直播技术方案。这不仅为后续活动积累了经验，更证明了省级广播媒体在技术赋能下的潜力——即便不是头部平台，也能通过精准策划和技术优化，实现传播效果的跃升。

此次实践更重要的成果，是团队对“媒体融合与全民阅读”关系的深层领悟：媒体不仅是阅读信息的传播者，更是阅读生态的建设者。基于这一认知，山西综合广播明确了未来方向：在内容上，将继续挖掘山西本土的阅读故事，如晋商故里的家训文化、红色老区的读书传统等，让全民阅读更具“地方辨识度”；在技术上，探索VR虚拟书屋、AI阅读推荐等新形态，增强互动体验；在合作上，联动学校、社区、书店等机构，构建“广播+线下”的阅读推广网络。这种“从传播到参与”的转型，正是媒体服务全民阅读的更高阶段。

山西综合广播的实践是新时代媒体参与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当技术不断重构传播方式，媒体的坚守与创新便有了特殊意义——通过有温度的内容、有创意的形式、有深度的引导，让阅读在快节奏的时代中找到一席之地。正如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所传递的，阅读不仅是个人的精神之旅，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修行。在这条修行之路上，媒体既是同行者，更是领路人。

(作者单位：山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节目中心)

礼法丛书：十年一剑的法律文化成果

赵晓耕



策略。但俞先生及其团队揭示的“礼法”，是以礼为合法性衡量标准的治国规范的总和。此种意义上的“礼法”论对“礼+法”“礼与法”之说构成了严肃而深刻的反思。

其次，“礼法”是有理想的法。吕思勉《中国通史》的“刑法”篇云：“个人在社会之中，必有所当守的规则。此等规则，自人人如此言之，则曰俗。自一个人必须如此言之，则曰礼。”礼起源于习俗，所不同者，俗是实然的、自发的，民众日用而不知；礼则是应然的、自觉的，经过了人类精英（即所谓“圣人”）的理性审视、精心提炼。《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说，礼法“是中国古代文化之‘道统’在法制上的体现……承载了志士仁人追求‘良法善治’的美好设计与愿景”，就是在此意义上立说的。这与陈寅恪所云“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犹希腊柏拉图之所谓Eidos者”，其实都是一种对传统法进行现代性转化的异曲同工的努

力。泛观丛书中的宋大琦《先王之法：礼法学的道统传承》、徐燕斌《奉天承运：礼法传统中的统治合法性自证》、范忠信《礼言法旨：传统礼经的法理和宪制释读》、刘依平《因理制礼：朱子〈家礼〉与礼法之治》均从各个角度发掘了礼法的理想法面相。正是这一重面相，揭示“礼法”乃是中国古代的“高级法”，优于强调工具性的律令法，即便君主也要受到相当的制约。

再次，“礼法”是有古老历史渊源的法。

纯粹出于理想的法，容易为统治者利用，以理想之名给民众的现实生活带来灾难。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礼法”为何能避免此种后果呢？因为“礼法”具有古老的历史渊源、深厚的生活根基。从时间上讲，礼法是一种“百王之所同”的先王之法，早于秦汉以降任何一个现实政权。礼法以经典的形式白纸黑字地写定，历代君主最多只能以注释的形式利用，而不可能直接篡改。儒家士大夫是礼法的忠实守护者、坚定践行者，他们构成了古代四民社会之首，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决定了君主不可能在礼法面前为所欲为。曹勣《帝图纲纪：〈白虎通〉的礼法世界》以具体个案，研究“先王之法”如何被现实政权确立为“国宪”；陈坤《天子门生：礼法传统中的科举取士制度》讨论“士”阶层如何被政权吸纳，又如何以礼法影响现实政治、司法；秦涛《天理·国法·人情：礼法传统中的狱讼制度》则陈述在以上种种配套制度包围之中，律令体系的狱讼制度是如何良性运作的；陈鹏飞《亲情与亲权：礼法传统中的“容隐”制度》，通过在礼法体制视野下重新识读“容隐”制度，揭示礼法对刑律中公权力制约，及其对户本位下亲权的维护。反观律令，是君主建国之后的立法成果，可

以根据君主意志立废修改，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在礼法统摄下的律令，才真正具有合法性、延续性。所谓“非礼无法”，不符合礼法精神的法律，即便是君主金口玉言，在合法性上也要打个折扣。

最后，“礼法”是有深厚生活根基的法。

如前所述，“礼”是从“俗”中提炼而来，民众日用常行的生活习俗就是“礼法”的源头活水，保证了“礼法”的强大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不需要聒噪不休的普法，因为礼法是从民众从小耳濡目染、社会熏陶而来；不需要大规模的暴力执法，因为礼法往往通过社会制裁作用于人的羞耻心来实现；不需要事事闹到官府、动用国家机器，因为有宗族长辈、乡里父老等社会权威便有资格解决大多数民间“细故”。高其才《礼失野求：礼法的民间样态与传承》从总体上研究礼法的民间样态与传承，陈寒非《讨个说法：礼法传统中的“细故”纠纷解决机制》从运作实态讨论礼法传统中的“细故”纠纷解决机制，丁新正《合二姓之好：礼法传统中的婚姻制度》、邓长春《光宗耀祖：礼法传统中的继承制度》、瞿见《立字为据：礼法传统中的契约文化》则分别探讨礼法制度下的婚姻、继承、契约制度。以“礼法”的目光下沉，“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的争议可以在人间烟火气中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左传·昭公元年》云：“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一个古老的国家能够长久存续于天地之间，必有其独特的立国之基。“礼法”之论正是从制度层面，对此种立国之基进行“自我表述”的初步尝试。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传统的礼法也有其不可忽略的负面价值。尤其在宋元以后，道学、礼教、科举均出现了僵化、形式化的趋

势，君主驾驭专制政体的技艺日趋娴熟，破坏礼法的阻力也越来越小。这些现象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丛书对此已有揭示，仍可深究，希望未来能够进行专门的研究。

最后必须指出，“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是出版社与高校学者团队精诚合作的一个典范。孔学堂书局从2015年策划本丛书起，至今年出齐全3辑，十年磨一剑的长期主义在当今学界尤显难能可贵。据说，地处贵阳的孔学堂书局是一家年轻的出版社，“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启动于书局初创之时，10年之中，社长、总编辑等领导层亦曾更换，但对这套丛书却紧抓不放。重识中华法系之礼法传统，以有鉴于现代法治建设，是著、编双方的初衷。书局对丛书的坚守，既是一种“求诸己”的君子之道，也是一种率先“律己”的自觉的契约精神，它是现代法治的入门之卷。

该套丛书的出版，对弘扬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是不无裨益的。

俞荣根先生在丛书序文的最后，深情地写道：“‘礼法文化是一座宝库，我们正在开启它！因此，我们对这套丛书充满期待！’对这套丛书，总编期待！书局期待！作者期待！更值得作者和编者共同期待的是，愿她能满足读者的期待！并得到读者‘上帝’的回应，尤其是批评和指教性的回应。”

随着“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的出版发行，作者和出版者的期待将迎来临收硕果。作为一名读者，我同样期待这则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礼法之论在学界的回应、争鸣、质疑中更趋完善，更期待中国传统法治文明能有更加精彩多样的自我表达！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